

怀念

杨宪益:中国文学的英译巨匠

曹丹红



194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新婚留影

初闻杨老杨宪益(1915—2009年),因为《红楼梦》。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斯刚出版了英译《石头记》(1973—1986年出版全本五巨册)。两年后,中国也出版了英译《红楼梦》(1978—1980年全本三卷),译者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两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面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里程碑。霍氏为意译,杨老为直译,代表文学翻译的两大方法,两个译本的不同特点与效果,是数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持续多年比较评论的课题。杨宪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巨大贡献,远不仅《红楼梦》而已。

在半个世纪里,杨宪益与妻子联手,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翻译为英文。范围涵盖先秦古文、敦煌变文、唐代传奇、唐诗宋词、宋明话本、清代小说、近现代文学的小说戏剧杂文等各种文体。作品自《诗经》《楚辞》《史记》《资治通鉴》,到《长生殿》《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到《鲁迅选集》《阿Q正传》《白毛女》等大量古今名著。译者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巴金、王安忆……一系列中国文学史上各译著,时间跨度长达2600多年,数量多达百余种,列出名单洋洋洒洒,前文只是随手拈来而已。

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对杨氏夫妇的评价是:“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若无他俩极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由此可见杨氏夫妇在翻译界的崇高地位与卓著声誉。

除了英文,杨宪益还精通拉丁文、古希腊文,外籍的戴乃迭则精通古法文,两人还将多部这些西方古文的名著翻译成中文,如拉丁文的古罗马史、希腊文的荷马史诗,从中古法文译出的法国中古史诗等。

杨氏夫妇所翻译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不少曾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对西方世界认识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授予杨宪益荣誉会员或院士称号。

2009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当代中国翻译界的最高荣誉奖项,仅季羡林、杨宪益二人获得。

杨老也就在当年离世,说他们夫妇“几乎翻译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当不为过。事实上,今后或许再难以有人当得起这一荣誉称号了。

一代才子

杨宪益一生,太多精彩,以下仅是略记点滴。杨宪益出身望族,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文赋,12岁就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破绿杨烟”的诗句。又好读老庄,笔记公案小说及武侠小说。13岁入天津新式教会学校,外籍教师均出自英国名牌大学。他晚年回忆说:“到了上高中时,我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通常我每天读一至两部,因此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19岁到伦敦,仅苦读5个月,就通过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

在牛津大学,杨宪益与英籍女生戴乃迭相恋,他为了她转读英国文学;而她原攻读法国语言文学,却为了他转攻中国文学,是牛津大学取得汉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牛津大学毕业后,杨宪益拒绝了去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决定回到战乱中的祖国。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想过离开中国。”杨宪益晚年受访时说。

1940年夫妇俩一起回到抗战中的中国,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任教,颠沛流离,生活困顿。1943年两人进入重庆由梁实秋负责的国立编译馆,开始以英译中国经典为终身事业。1949年,两人婉拒了时任国民党教育次长杭立武的赴台邀请。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俩应在北京主持外文出版社的刘尊棋安排,调入该社从事专业翻译(按:1941年刘尊棋曾一度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主任,80年代末刘老曾率团访问,笔者有幸在仁定巷报业中心参与接待)。

除翻译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经典,夫妇两人还负责翻

译大量的领导指示与文件。“文革”中遭诬入狱四年,出狱后夫妇两人又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翻译名著积叠起来足与人身等高,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打油诗风与性情

杨宪益在翻译事业上的不凡成就,既是功力,也是语言天赋。对杨老的翻译世界,笔者才疏学浅,实难涉猎,岂敢置喙。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他晚年写的打油诗,这是一个展现他文人性格才情的个人世界。

民国以来,许多新文化人都爱写打油诗,如胡适、蔡元培等各大名士,都有此一手,周作人更以打油诗(又自称“杂诗”)闻名。当代名士启功也写了不少打油诗,如其著名的《自撰墓志铭》就是。

杨宪益1972年获释,牢狱归来,以诗言志,从此诗情勃发,专写打油诗。他出狱后最先写的《狂言》诗云:“兴来纵酒发狂言,历经风霜未改颜。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聚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就已显露他的打油诗风与性情。

杨老的打油诗,无论自嘲或记事,都是“寓庄于谐”,于嬉笑怒骂中讽喻世事,但始终有其理想情操,是生命中一种“含着眼泪的微笑”。如嘲讽时人人事的《时装表演》:“时装表演演高潮,楚国而今爱细腰。莫怪婀娜多作态,只因身着窄旗袍。”又如以自嘲讽世的《住公寓有感》:“一生漂泊等盲流,到处行吟乱打油。无产难求四合院,余财只够二锅头。人间虽少黄金屋,天上修成白玉楼。堪笑时人置家业,故居留得几春秋。”

再如《晚年》诗:“蹉跎岁月近黄昏,恃欲轻言无一能。呐喊早成强弩末,离群犹念故人恩。”写来豁达,有情有义(念故人恩),并不自艾自怨。

杨宪益晚年,在其北京家中墙上,挂有京城名士王世襄书赠他的一幅赞语:“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他却自注称:“难比圣贤,冒充名士,不甘寂寞,自作风流。”

写来旷达幽默,却又有棱有角,尽是学识性格才情的交集流露。只是他的寂寞和风流,又有多少人知道?或许,他本来就不放在心上。因为看透,也就无所谓了。

手稿机缘

杨老的才情与性情,令人心仪。杨老生前,共有五本和他有关的传记出版,先后是:

1. 杨宪益:《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书名意译),意大利文译本,意大利出版,1991。
2. 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译本,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3. 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4. 杨宪益:“White Tiger: An Autobiography of



晚年的杨宪益夫妇在北京

Yang Xianyi”(中译:白虎堂照命),英文原稿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5. 雷音:《杨宪益传》,作者自费出版,2004.07(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这五本传记中,三本署名杨宪益者,其实都是同一部作品,因原稿为英文,至于原文和中文则是他人的译本。

这份英文打字机原稿,为杨宪益生平唯一亲撰英文自传,是1990年他应意大利友人(一位但丁学会学者)而写,英文原稿当年已寄意国。另两本中文传记,则分别是邹霆和雷音两位作者所写,是根据他们各自和杨老交往所得加上其他材料整理所撰。

由此可知,杨宪益生前并未写过中文自传,然而,2015年笔者却有幸得遇一批杨老亲笔所书的中文自传手稿!这批手稿,原为二十多年前杨老写给他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邹霆,为其家属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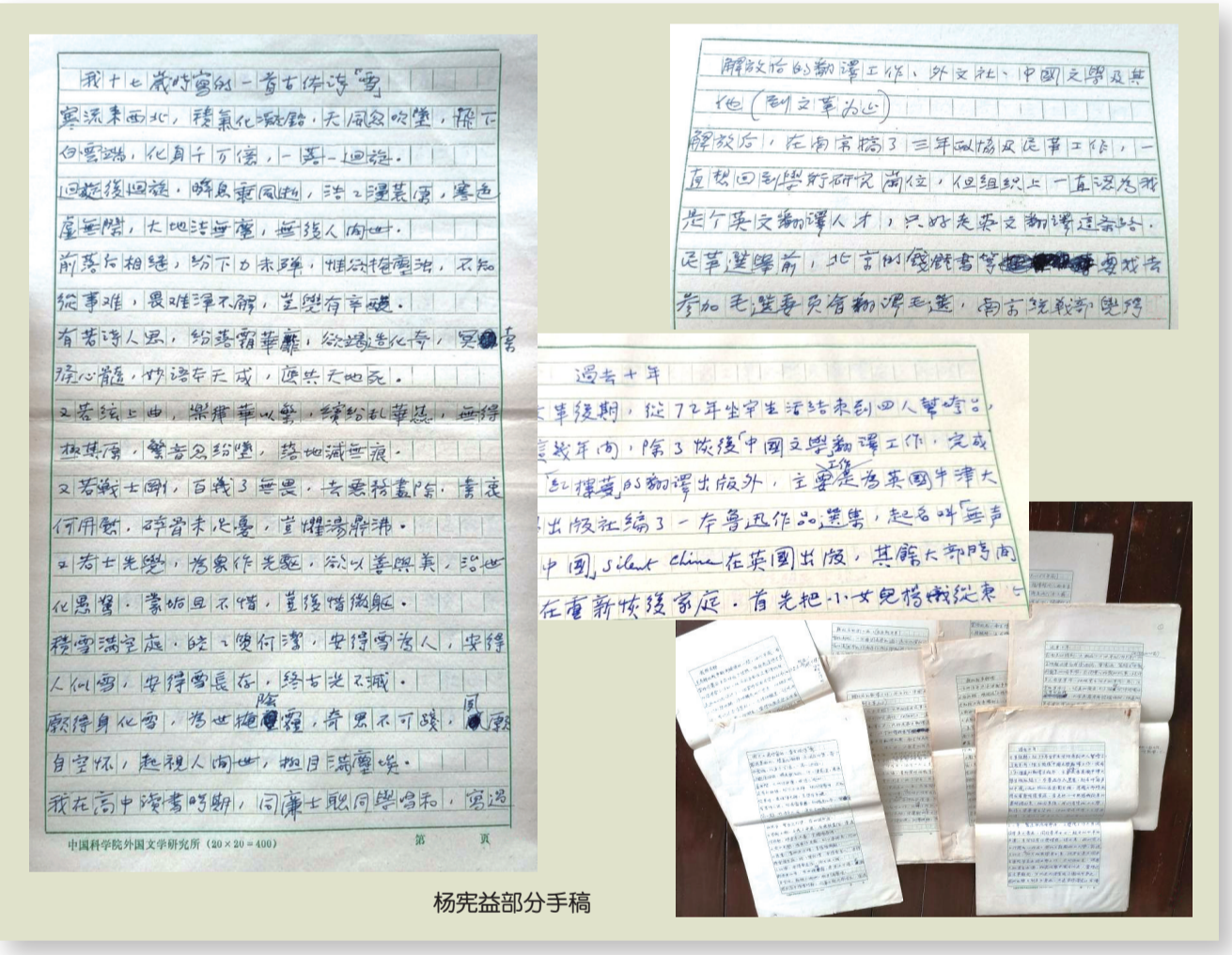
随稿件附有一件信札连原封,信札内容为杨老应邹霆要求,补写1976年到1984年10月重返牛津大学讲学经历。信封只写:“四楼中国建设中文版编辑部邹霆同志/杨”,显然是由人直接转交而非邮寄。

整批手稿,纸本九份,共计96页,题目如下:《我十七岁时写的一首古诗(雪)》《解放战争杂忆》《我与民联》《解放后的风风雨雨(1949—1952年底)》《解放后的风风雨雨(到北京以后到1957年反右运动)》《解放后的风风雨雨(反右到“文革”为止)》《“文革”十年》《过去十年》。由此可知,除第一篇和早年生活有关,内容全是40年代后期至晚年的经历,等于杨老的后半生自传。

杨老当年亲笔写下这批中文手稿,交付邹霆,相信是为了确保与内容有关的人事记述无误,或许也以为该传记全文收录,但邹霆的著作,内容却是以报道文学形式出版。或因当年出版情况考量,仅自这批手稿取材,并未收录手稿原文,故外界也不知道杨老曾有这批中文自传手稿存世。幸亏邹霆将这批手稿全部保留下来。

近年来,相继有不少各式杨宪益传记或亲友回忆的著作出版,但其中只有一部是杨老生前亲撰的自传,唯原稿并非手写,只是英文打字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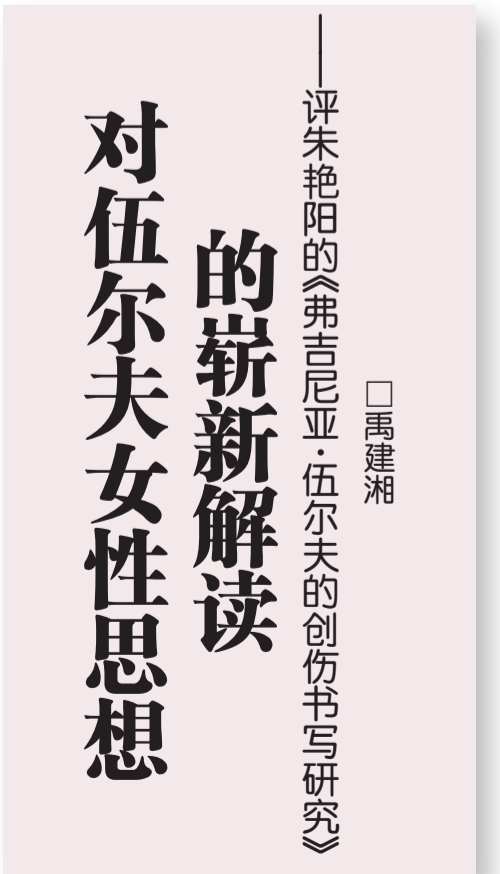
以笔者目前所见所知,当年杨老写给邹霆的这批手稿,应该是杨老唯一存世的一批中文自传手稿,虽非全传,但涵盖其下半生岁月,已属难得。



杨宪益部分手稿

朱艳阳的学术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研究》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朱艳阳耗费六年光阴,运用心理创伤学的方法探讨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整体而深入地发掘出了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家与作家的心理困境及其疗伤式的书写。朱艳阳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伍尔夫的女性创伤书写是富有女性个体色彩的,其心灵悲剧在时间上是持续的,在内容上是复杂的。对于伍尔夫创伤书写的研究,朱艳阳更多地吸收了国外顶级心理学家如卡西·克鲁兹、德瑞·劳伯、多米尼克·拉卡拉、乔恩·艾伦等人



的相关论述,她将这些学术成果引入到伍尔夫的研究中来,这些心理学成果的很多片段论述首次出现在本书的译介中,一方面为本书的系列论述奠定了稳固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增添了本书的学术含金量。朱艳阳不仅从心理学的宏大视域中



弗吉尼亚·伍尔夫

对伍尔夫的创伤书写进行了整体审视,而且还以心理创伤学的独特视角对伍尔夫的艺术创作进行了创新性审视。

本书将伍尔夫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细致地划分为死亡创伤、性别创伤与战争创伤三大类别,详细说明了伍尔夫的至亲先后离去、兄长凌厉暴戾、战争残酷无情对于伍尔夫的心灵所造成的深刻伤害,深入探讨了伍尔夫面对种种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文学创作释放情绪、化解困境、治愈创伤,并独到地提出伍尔夫化解困境、释放情绪的三种主要方式。为此,朱艳阳相应举出了伍尔夫的生活实例及作品文本作为印证,比如,本书还运用了多种资料证明了伍尔夫的性冷淡状况,认为伍尔夫的

这一情感表现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后天塑造而形成的,伍尔夫的屡次自杀不能仅仅看作是其对于生活的逃避,而是明显透露出了反抗不合理现实的倔强与顽强。本书丰富的材料论证,使得其论述更有说服力。

本书从多个角度、多层次展现了伍尔夫精神创伤书写的不同面相,指出这种创伤书写的美学呈现。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文学性创伤”源自“医学性创伤”,后者是前者的生理性成因,前者是后者的艺术化表现。朱艳阳分析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的男主人公拉姆齐先生,认为分明就是伍尔夫生父的艺术投射,因此被描写为既具有英国知识分子的睿智书卷气,却也保留着专横的家长制作风、喜怒无常的小文人心态。而伍尔夫对于母亲朱莉亚的情感,则艺术化成为了对拉姆齐夫人贤淑善良性格的描摹展现。朱艳阳的这种文本解读,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分析之后进行的,具有学者的严谨性与文本阅读的深邃性。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性别创伤表现在“对性与婚姻的畏惧”“对传统妇女教育的憎恨”“对女性情谊的认同”三个方面,她以伍尔夫的小说《远航》《达洛维太太》作为文本分析,细致地梳理出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伍尔夫认为婚姻束缚了女性自由,从而产生了对英国传统塑造女性“贤妻良母”形象的憎恨,并且将这种对异性关系的否定曲折化成为了对同性关系的肯定,进而促成了伍尔夫对女性情谊的认同。而伍尔夫创伤书写的美学主要呈现为“复杂多样的创伤性意象”“纷纭散乱的意识之流”与“多元融合的文体叙事”,而“钟声”“房间”“伦敦”和“海洋”四个意象成为其主要载体。“钟声”是一种象征着死亡的意象,它凝聚了伍尔夫对于时间与生死问题的探讨;“房间”是“指向男权社会的一个隐喻”,“房间”不仅是传统男权社

会禁锢女性的空间场所,更是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私密空间;“伦敦”则是伍尔夫内心当中的文明寄托之圣地,是高雅情操与典型文明的代表;“海洋”是“人世的险恶与变幻莫测”的象征。朱艳阳对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的美学分析很独到新颖,让我们对伍尔夫文本的理解从女性主义拓展到更深的层次,体现出学术的启发性。

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创伤书写并不仅仅停留于对个体受伤情绪的宣泄,而且还还烙铸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纯粹博爱的追求、对共同社会理想的追寻。本书从“向死而生”“超越死亡”两个角度展现了伍尔夫独特的死亡观,固然各种各样的死亡给予伍尔夫深深的心灵创伤,但她仍认为,死亡才能给予人勇敢前行、认真生活的精神力量,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主人公反复品味生死之真谛,对后世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尔夫所倡导的“雌雄同体”,实际上是要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追求和谐、幸福、欢乐、祥和、美满的两性关系,在受到某些无耻男性的沉重伤害后,伍尔夫仍旧认为女性应当以不卑不亢的平等态度对待男性。伍尔夫所追求的和谐圆满之社会理想,实质要求人类付出“爱的奉献”,以达成“爱的和谐”。朱艳阳指出伍尔夫“走向融合”的思想是人类友爱和谐的最高境界,人类只有通过互惠互爱,才能推进彼此走向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谐。伍尔夫作品中的这种“爱与和谐”式的融合,不仅是形式上的团结一致,而且更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强烈认同、熔铸,这种“爱与和谐”式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带领人们走出彼此纷争的境况,引领人们走向幸福完满和美境地。朱艳阳这部专著新见频出、卓思纷呈,既有学术见地,更见扎实材料,对伍尔夫思想的崭新解读丰富了学界对这位女性主义先驱的更深入理解。

曹建湘

对伍尔夫女性思想的崭新解读